

澳門漢語雙言制研究

閻 喜*

一、引言

澳門是歐洲人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第一個聚居區，又是其在亞洲的最後一個殖民地。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不再存在，澳門的回歸標誌着西方殖民統治在中國的徹底終結，也標誌着白人在亞洲統治的結束，同時也標誌着葡萄牙約500年的殖民歷史的最後終結。

澳門回歸十年來，澳門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澳門的社會語言格局也經歷着深刻的變化。儘管澳門的面積較小，但是澳門的語言使用情況和香港比起來，比後者要複雜得多。許多學者用“三文四語”概括澳門的語言特點（“三文四語”的“三文”是中文、葡文、英文，“四語”是普通話、粵語、葡語及英語）。作為一個語言博物館，在澳門，人們使用的語言有漢語、葡萄牙語、英語、日語、韓語、法語等多種語言。同時澳門也是一個中國方言的博物館，在這裏人們會聽到廣東話、福建話、客家話、上海話、以及許多北方方言。廣東話在澳門回歸前後依然是澳門社會的常用語。1992年中文作為官方語言確立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開始影響澳門這座城市。儘管葡萄牙語在回歸前在澳門政府和法律佔據主導地位，而且《澳門基本法》也明確規定了葡萄牙語在澳門和中文都享有正式語文的地位，但是葡萄牙語在澳門回歸前後卻經歷着起起伏伏。英語在澳門有着較長的歷史，它也是毗鄰澳門不遠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語文之一，而這個國際通用語也正在進入澳門社會的各個領域。由於廣東話、普通話、英語、葡語，以及其他各種語言和方言在澳門社會中被使用，澳門的社會語言情況紛繁複雜。然而，並沒有許多學者對澳門的社會語言情況進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例如，

我們發現許多學者已經對香港社會的雙言制現象做了大量的研究¹，但是對於澳門雙言制的專門研究並不多見。²

Ferguson建議雙言制研究應該對一個給定的社區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歷時地進行追蹤，或者是對處於一個社會語言急劇變化時期的社區進行追蹤。³ Hudson也強調雙言制歷時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對於各個語言功能的共時分佈，雙言制的歷時角度——它的社會發生、跨時間的發展路徑和最終結果——在涉及社會語言學理論的情況下是最重要的。”⁴ 本文以澳門漢語為研究對象，通過運用Snow的傳統雙言制(traditional diglossia)與現代雙言制(modern diglossia)理論⁵，着重分析澳門漢語雙言制的演變情況，希望本研究能夠對五百年來澳門社會語言格局的歷史演變做一個較為清楚的描述。

二、雙言制理論

提起雙言制這一概念，許多人會想到已過世的社會語言學家Charles Ferguson在1959年學術期刊*Word*上發表的題為*Diglossia*的文章。⁶ 儘管如Hudson所指出的，“一個清晰連貫而又普遍接受的雙言制理論尚未形成”⁷，雙言制理論仍然具有強大的持久影響力，而且不容易衡量雙言制這一概念對社會語言學的深遠影響。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以後，許多學者運用Ferguson的雙言制理論分析世界各地的言語社區，並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和專著，Hudson詳細地列舉了有關雙言制研究的書目。⁸ 一些重要的語言學期刊如*Southea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等都設專刊研究雙言制。此外，許多有影響力的社會語言學讀本都收入

*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Ferguson的這篇文章。⁹

雙言制理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受到了世界各地學者的廣泛關注。Ferguson對雙言制的定義如下：雙言制指一種相對穩定的語言狀況，其中除了一種語言的主要方言之外(可能包括一種標準語或數種地方標準語)，還有一種非常不同而又高度規範化的高位變體(通常其語法較複雜)。該變體是較早時期或另一言語社區受人尊重的書面文學的載體，是通過正規教育可以習得並用於書面和正式口頭交流的目的，但是社區中沒有人在日常會話使用該變體。¹⁰ Ferguson還為確定一個社區是否屬於雙言制提出了九個特點：功能、聲譽、文學傳統、習得、標準化、穩定性、語法、詞匯和語音。

許多學者運用雙言制概念研究各自所處的言語社區，並對Ferguson的雙言制理論進行修正。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雙言制理論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理解，在這些不同的理解中，Hudson認為“沒有哪一種理解比Fishman(1967)有關雙語和雙言關係的文章和其之後二十多年來的各種修正(Fishman, 1970, 1980, 1985, 1989)更有深遠的影響力。”¹¹ Fishman增加雙語概念來擴展雙言制概念。¹² 根據Fishman，雙言制指的是在社會層面不同語境中兩種語言或變體的使用，而雙語指的是個人對兩種語言的使用及知識。他詳細地介紹了雙言和雙語的關係，並指出四種可能性：①雙言又雙語；②雙言但非雙語；③雙語但非雙言；④既非雙言又非雙語。

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見證了雙言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Snow將東亞的雙言制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禮拜儀式的高位語言和當地的低位土語；第二種是國語高位語和當地低位的少數民族土語。¹³ 第一種雙言制的例子包括歷史上幾個世紀來在日本、朝鮮和越南居於主導地位的古漢語。第二種雙言制與第一種有所不同，指的是一國的國語作為書面語和口語在社會裏享有高的地位，而低位語是一種當地的少數民族土語。第二種雙言制的例子包括現代漢語和吳語、台語的書面語形式。Snow又把雙言制分為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制。¹⁴ 在歐洲傳統的雙言制裏，拉丁文在幾個世紀裏一直是高位語，而各個歐洲國家的民族語言則是低位語。與此相似，在20世紀前的大約兩千年裏，東亞地區(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也存在着這種傳統雙言制。傳統雙言制的特點主要有：①它發生在前現代社會裏，換言之，這些社會沒有：發達的商業性出版業和印刷文化、官方推廣提高大眾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政府推廣的全國範圍的語言政策、傳播媒體業和

文化。②在傳統雙言制裏，高位語是Benedict Anderson提到的“神聖語言”，換言之，一個古典語言與一種或多種基於經典文本的傳統或哲學傳統緊密相連。(通常這種語言還有着一個很長的書面文學傳統)。這種高位語通常不再為任何人作為日常口語使用，可能它從來沒有作為日常口語使用過。③這種雙言制在前現代時代很普遍，許多當代的雙言制現象都源於這種雙言制。④這種雙言制由社會格局所維持，在這種社會格局裏，識字率相對有限，高位語的識字率是社會精英權力的主要來源之一。¹⁵

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都遇到了西方列強的威脅，各國的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現代化的必要性，在他們現代化的過程中，古漢語逐漸喪失了高位語的地位，原來的雙言制逐漸消失，Snow總結了導致傳統雙言制消失的幾個因素：①現代化涉及推廣識字率和教育，而使用人們熟知的低位口語而不是較難的高位古典語言更容易達到這個任務。②國家建設涉及推廣一種熟知並廣泛使用的口語作為國家語言，要麼是因為它作為象徵國家身份和驕傲的價值(日本和朝鮮)，要麼是因為它的實用價值(中國和越南)。③國家建設未必能維持雙言制或古典高位語。事實上，日本的國家建設所反映的西方國家的模式表明一個國家的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是一個明顯的優勢，而且一個方言可以有效地，如果不能比一個更有威望的古典語言更有效地，作為一個國家語言的基礎。¹⁶

隨着傳統雙言制的消失，在一些地區(如香港、瑞士德語區)出現了新的雙言制，即現代雙言制。Snow總結了現代雙言制的特點：①它發生在現代社會裏，換言之，這些社會有一個商業性的出版業和印刷文化，官方推廣提高大眾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政府推廣的全國範圍的語言政策；和傳播媒體業和文化。②雙言社會位於一個更大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或文化軌道，雙言社會認可和這個國家一定程度上共享的文化遺產；但是，該雙言社會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獨特的文化身份。③在現代雙言制裏，高位語是一個國家的國語，它是一個現代標準語言——包括它的口語和書面語——並且有許多人可以流利地講這種語言。④現代雙言制並不像傳統雙言制常見。⑤現代雙言制主要是通過認同維持。在雙言社區，掌握高位語通常因為其實用價值和與一個更廣泛的文化遺產和傳統相聯繫而具有價值。但是，該社區也具有較強的本地認同，和維持本地獨特文化身份的欲望。因此，即使該雙言社區有許多人能夠講高位語而且能夠以

這種語言進行閱讀/寫作，他們更願意講低位語。使用低位語的偏好成為該社區的一個重要身份認同行為。¹⁷

三、澳門雙言制：從傳統雙言制到現代雙言制的歷史演變

在澳門的歷史上，長期以來文言文一直是高位語，文言文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與文學、哲學和宗教文本緊密相連。但它並不是人們的母語，也不是人們日常口頭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人們一般通過私塾等教育機構學習這種語言，並進而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成為社會精英。在《澳門教育史》一書中，劉羨冰指出，在澳門早期，“學塾、書屋、社學，與內地明末、清初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望廈村民趙元略、趙允菁父子先後於乾隆丁酉科(1777年)、嘉慶辛酉科(1801年)中舉，不但成為澳門讀書人的美談，趙家大屋高懸的“父子登科”的橫匾，也成為澳門教育史的珍貴文物。”¹⁸ 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澳門人民對於文言文這一高位語的積極態度。與此同時，澳門華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自己的方言土語，如粵語、客家話等等。這些方言土語與文言文在語音、詞匯、語法等多方面存在着差異。

19世紀中葉，中國社會內憂外患。國內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西方列強紛至沓來，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多次交戰中都失敗告終，向西方列強割地賠款。眾多有識之士開始了向西方和日本學習，走上了救亡圖存的道路，並逐漸意識到語言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許多學者提出了各種方案，旨在改革中國語言，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其中以現代文取代文言文為代表。隨着現代文取代文言文，言文實現一致，中國社會傳統的雙言制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澳門已經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並在語言政策上與中國內地有所差異。但是由於抗日戰爭，內戰等多種原因，許多人來到澳門避難，並在澳門定居下來，這些人也帶來了以現代漢語書寫的文本，使得現代漢語在澳門的影響逐漸增加。同時，由於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化的緊密聯繫，使得澳門華人對現代漢語沒有太大的抵抗性。澳門出現了推廣和學習現代漢語(尤其是口語國語)的高潮。例如，1937年，從北京到澳門的知識分子把國語推廣到澳門，其中著名的有關玉書、何仲恭、王菊如等。1937年後，從廣

州來澳的知識分子也在澳門開展國語運動。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黃耀樞。¹⁹

回歸以後的澳門，廣東話在諸多高位領域擴展其使用範圍，而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普通話)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逐漸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政治領域，普通話主要是在與大陸領導人見面時使用，而廣東話則在澳門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從政治選舉，到立法會會議，都能聽到廣東話的聲音。通過採訪澳門特區政府不同部門的公務員，Lam發現“中國同事間口頭交流傾向於只用廣東話，而書面交流，如備忘錄、便條、報告、表格、電郵等等，大多傾向於使用現代漢語。”²⁰ 在經濟領域，澳門是一個國際旅遊城市，近幾年來，每年都有逾千萬的內地旅客來澳，其中個人遊居多，而中國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也遠遠超過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來澳旅客。面對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掌握普通話和廣東話對於澳門旅遊、博彩、餐飲等相關行業必不可少。在教育領域，長期以來，廣東話一直是許多私立學校的教學語言，但是隨着澳門的回歸，很多學校開設普通話課程，一些學校，如濠江中學，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在傳媒方面，同時回歸後的澳門，在廣播電視節目中也增加了普通話節目，但是人們一般收聽收看本地廣東話節目，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澳門與香港相鄰，澳門人還可以較為容易地購買香港中文報刊，收看收聽香港的廣東話廣播電視節目。而港澳的廣播電視節目中的廣東話與報紙雜誌中大量使用的粵方言字，對澳門人的本地身份認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居於主導地位，被廣泛使用，而普通話在人們(尤其是內地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許多中國北方人移民到澳門或在澳門工作學習初期，由於尚未學會廣東話，他們也傾向於使用普通話作為交流工具。

綜上所述，澳門回歸以後，澳門廣東話的使用範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教育領域等，都有廣東話的影響。與此同時，現代文也不再僅僅是高位語，其口語形式，普通話逐漸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

四、澳門與國際參照值比較

澳門現代雙言制與香港，以及瑞士德語區在社會類型，高位語的本質，雙言制穩定性問題，雙言制演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以及雙言制的維持等諸多

方面有相似之處：

第一，在社會類型上，澳門屬於現代社會，其現代性具有兩層含義：①它不同於歐洲以拉丁文為高位語的傳統雙言制和東亞以文言文為高位語的傳統雙言制，是現代版的雙言制。②該雙言社會受到工業化、城鎮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不同於以往的雙言社會，以往的雙言社會沒有經歷現代化，而那些經歷了現代化的社會，通常表現為低位語擴展其功能並取代高位語和雙言制的消失。

第二，高位語的本質：澳門的高位語，即現代漢語在中國是國語，許多人以現代漢語的口語形式(普通話)為母語，也有很多人雖然不是以普通話為母語，但是能夠熟練地使用這種語言。例如，根據 2006 年澳門中期人口普查結果，除了家中常用語言，有 54.0% 的居住人口表示可流利使用另一種/多種語言與人溝通，其中以懂普通話的比例最高，達到 65.3%。按常用語言及其他可使用語言合計，發現 3 歲及以上居住人口中，91.9% 懂廣州話，38.5% 能使用普通話。而以往傳統雙言制中的高位語，如文言文、拉丁文，其地位來自與這種語言相聯繫的宗教、哲學和文學傳統。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這種語言，其實用性不高。

第三，穩定性問題：傳統雙言制的穩定性較強，例如東亞地區的傳統雙言制持續上千年。而現代雙言制的高位語和低位語的角色則不斷變化，缺乏相對穩定性。如上文所述，澳門粵語在諸多高位領域擴展其使用範圍，而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普通話)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逐漸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四，雙言制演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澳門人對中國有較強的文化認同。近年來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 2007 和 2009 年聯合開展的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以及 2008 年聯合開展的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這幾項調查結果都顯示大多數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²¹ 此外，澳門與中國相鄰，中國的國語易於影響澳門的書面語言。與此同時，由於澳門享有相對的自治權力，並沒有像中國內地那樣廣泛地推廣現代漢語。

第五，維持雙言制的身份問題：對於澳門人的身份問題，有許多研究都表明澳門人持有雙重身份。1999 年澳門回歸以後，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對澳門學生的身份進行了多次調查。第一次調查是在 2007 年對澳門中學生進行調查的。通過便利抽樣，研究者收到 732 份的有效問卷。研究結

果表明 91.78% 的受試者認為自己是澳門人，93.27%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第二次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調查是在 2009 年進行的。通過配額抽樣和便利抽樣的混合，研究者收到 1,088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表明 91.2% 的中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是澳門人”，90.6% 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是中國人”。第三次是在 2008 年對澳門大學生的國民身份進行的問卷調查。通過便利抽樣，790 名高等學生參與問卷調查，最終收到 727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表明 88.3% 的參與者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是澳門人”，而 93.3%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三次問卷調查結果都發現大多數澳門學生認同自己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換言之，澳門人的身份有兩個成分：本地身份和國民身份。二者緊密相連而不是彼此排斥的。這可以在 2007 年澳門居民反對在澳門東望洋燈塔附近建超高樓的事件中可以看出。Kaeding 報道了在 2009 年與 59 名澳門大學的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93.2% 的學生選擇大三巴作為澳門的代表，44% 的學生對這一遺產表示驕傲。²² 另一方面，澳門身份的國家成分表明澳門人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具有認同感。例如，在 Kaeding 的研究中，93.2% 的學生對萬裏長城感到驕傲。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澳門身份中的本地和國家成分界限並不是很清楚，越來越多的澳門人具有雙重身份。

從語言的角度來說，一方面，現代漢語成為澳門社會高位語有賴於澳門人對祖國的認同。中文在澳門官方地位的確立，已經提升了現代文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與威望，不少澳門人選擇現代文這一民族共同語。葡萄牙在澳門的長期殖民對澳門的現代漢語，尤其是中文公文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我們曾對澳門一所高等院校的 98 名澳門本地大學生進行語言態度調查，其中一項是“澳門政府應該採取措施規範澳門中文公文”，研究結果顯示 72.9% 的學生同意該項，13.5% 的學生強烈同意該項，這也從某種程度反映出澳門人對現代漢語的認同。澳門回歸以後，許多學者對澳門中文公文存在的“葡式中文”現象進行了許多研究²³，澳門理工學院和行政暨公職局都開設中文公文寫作課程(見表 1)，並編寫專門的教材²⁴，以期規範澳門中文公文。

與此同時，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形式普通話，在澳門越來越重要的實用價值也是確保現代漢語在澳門高位語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廣東話在人們日常生活、教育、媒體等諸多領域得到廣泛使用，是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廣東話能夠維持其低位語地位的重要因素。

表1 澳門機構院校開設中文公文寫作課程情況(人次)

年份 機構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澳門理工學院				11	100	75	100
行政公職局*	61	74	53	26	46	101	108

註：* 與澳門理工學院合辦。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各年《教育數字概覽》的相關數據

對於澳門現代雙言制的形成與維持，本文同意 Snow 的觀點，不過，除了 Snow 指出的各個因素，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在澳門現代雙言制的形成和維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澳門基本法》的頒佈對於澳門現代雙語制的形成與維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澳門基本法》第 9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這條法規明確地表明了中文在澳門的官方法定地位，但是並沒有明確地說明繁體字和簡體字，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地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並不在《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在澳門適用的法律，所以不需要在澳門推廣簡體字和普通話。這就保證了繁體字和廣東話在澳門可以繼續使用，也成為澳門現代雙言制形成和維持的重要保證。

另外，有關繁體字的語言神話和語言意識形態對於澳門的現代雙言制的形成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Michael Silverstein將語言意識形態定義為“語言使用者做出的用來解釋觀察到的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的對於語言的任何觀念的集合。”²⁵ 語言意識形態對於語言結構和使用的研究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它在聯繫語言形式和社會意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語言的意識形態為我們研究語言和社會的互動提供了一個關鍵性的窗口”²⁶，“語言的意識形態具有人類學意義不單單是由於它的交際民族誌的變化性，而在於它是社會形式和交談形式之間的一條協調鏈……語言的意識形態影響着語言和身份、美學、道德和法律之間關係的形成以及人們對於這些關係的認識，它們不僅支撐着語言的形式和使用，而且支撐着人、社會團體和宗教儀式、兒童的社會化、性別關係、國與家、教育和法律等根本的社會機制的概念。”²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繁體字在中國文學，政府文件和

科舉考試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繁體字不僅是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它還與中國書法緊密聯繫。繁體字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神聖和純潔的語言，和中國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都緊密相連。所以，很多人對繁體字都持有這樣一種語言意識形態，即繁體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精華和載體。它代表着文化的延續性，純潔性和真實性。

五、結論

本文通過運用 Snow 有關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制的理論，對澳門社會幾百年來漢語雙言制格局的演變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發現澳門社會的漢語雙言制格局從 20 世紀前的傳統雙言制演變為現代雙言制。通過對澳門社會類型、高位語的本質、雙言制穩定性問題、雙言制演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以及雙言制的維持等多方面進行分析，發現澳門與香港、瑞士德語區在這些方面存在相似之處，表明了 Snow 有關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制理論在澳門語境的適用性。同時認為《澳門基本法》沒有對處於官方地位的中文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也沒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適用於澳門，這是澳門現代雙言制形成和維持的一個重要保證。此外，有關繁體字的語言神話和語言意識形態對於澳門現代雙言制的形成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僅僅是對澳門社會漢語雙言制現象的一個初步探討，並沒有考慮英語、葡語等其他外來語言。澳門是一個典型的多語多方言的社會，希望本研究能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學者關注澳門社會與語言，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推動澳門社會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註釋：

- ¹ Luke, K.-K. and J. C. Richards (1982). English in Hong Kong: Functions and Status. *English World-Wide*, 3(1). 47-64. Li, D. C. S. (1999). The Functions and Status of English in Hong Kong: A Post-1997 Update. *English World-Wide*, 20(1). 67-110. Snow, D. (2010a). Diglossia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0(1). 124-151. Snow, D. (2010b). Hong Kong and Modern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6. 155-179. 陸鏡光：《從雙語雙言看香港社會語言變遷》，載於《中國社會語言學》，2005年第1期，第82-88頁。蘇金智：《香港言語社區兩文三語的格局及其變化》，載於《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第41-47頁。
- ² Yan, X. (2010). Diglossia in Macao. Presented at The 15th English in South East Asia Conference. Macao. 9th-11th December 2010.
- ³ Ferguson, C. A. (1991). Diglossia Revisited. *Southwe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 (1). 231.
- ⁴ Hudson, A. (200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7. 8-9.
- ⁵ Snow, D. (2010a). Diglossia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0(1). 124-151. Snow, D. (2010b). Hong Kong and Modern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6. 155-179.
- ⁶ Ferguson, C. A. (1959/2000). Diglossia. In W. Li (Ed.). *The Bilingualis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65-80.
- ⁷ Hudson, A. (200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7. 1.
- ⁸ Hudson, A. (1992). Diglossia: A Bibliographic Review. *Language in Society*, 21(4). 611-674.
- ⁹ Li, W. (Ed.) (2000). *The Bilingualis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Paulston, C. B. and G. R. Tucker (Eds.). (2003). *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 Blackwell; Li, W. (Ed.) (2007). *The Bilingualism Reader*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Coupland, N. and A. Jaworski (Eds.). (2009).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¹⁰ Ferguson, C. A. (1959/2000). Diglossia. In W. Li (Ed.). *The Bilingualis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75.
- ¹¹ Hudson, A. (1991). Toward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Diglossia. *Southwe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1). 3.
- ¹² Fishman, J. A. (1967).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29-38.
- ¹³ Snow, D. (2004).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¹⁴ Snow, D. (2010a). Diglossia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0(1). 124-151.
- ¹⁵ *Ibid.*, 146-147.
- ¹⁶ *Ibid.*, 140.
- ¹⁷ *Ibid.*, 147.
- ¹⁸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頁。
- ¹⁹ 同上註，第246-250頁。
- ²⁰ Lam, K.-C. (2007). *English in Post-1999 Macau: The Functions and Status of English*.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u. 45.
- ²¹ 見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7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9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8年。
- ²² Kaeding, M. P. (2010). The Evolution of Macao's Identity: Toward Ethno-cultural and Civic-base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9(1). 133-168.
- ²³ 程祥徽：《澳門中文公文的回歸之路》，載於《語言文字應用》，2001年第1期，第82-86頁。盛炎：《談澳門地區中文公文中的語言問題》，載於《方言》，2001年第2期，第166-170頁。
- ²⁴ 李向玉：《中文公文寫作教程》，澳門：澳門理工學院、行政暨公職局，2000年。

- ²⁵ Silverstein, M. (1979).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 In P. R. Clyne, F. Hanks and C. L. Hofbauer (Eds.). *The Elements: A Parasession on Linguistic Units and Levels (CLS1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3-247.
- ²⁶ Park, J. S.-Y. (2009).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Global Language: Ideologies of English in South Kore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5.
- ²⁷ Woolard, K. A. (1998). Introduction: Language Ideology as a Field of Inquiry. In B. B. Schieffelin, K. A. Woolard and P. V. Kroskrity (Eds.). *Language Ide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7.